

中國的多邊外交： 台灣學術社群研究之比較分析

冷則剛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賴潤瑤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摘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瞭解台灣學者如何研究中國的多邊外交，研究成果展現了哪些特色，以及與國際學術界研究此一議題的連結。有關台灣學者研究成果收錄的範疇，則主要以2012年之後的著作為主。本文首先就中國官方及學術界，以及國際學術社群，針對中國多邊外交概念及理論架構的研究，以及政策與執行層面的分析，作一整理爬梳。接下來則探討台灣學者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總體性研究，作出了何種貢獻，其與國際關係中多邊外交分析傳統的關聯性如何。此外，本文也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個案，探討台灣學者研究成果與國際學術界研究取向之異同。選擇的案例則以中國與東協的關係、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為主。本文最後則從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出發，提出未來研究議題與方向的建議，以期對未來的研究發展貢獻綿薄之力。

關鍵詞：多邊外交、中國崛起、一帶一路、亞投行、國際組織

* * *

壹、導論

多邊主義是當代外交政策研究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以世界超強的地位，建構新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這個秩序的經濟支柱，是布列敦森林體系之下所建構出來的多邊架構，諸如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隨後的世界貿易組織等。在安全上，則建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多邊安排。在蘇聯陣營中，也有華沙公約組織等多邊的制度建構。在全球架構下，則有環繞著聯合國的多邊制度性安排，以及各種區域性的多邊制度安排。因此，多邊主義並不是權力分散，而是大國外交行使的另一種工具。大國透過多邊外交的安排，一方面協調盟國的共同行動，另一方面連結國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既提供公共財，也極大化權力的廣度及深度。此外，大國主導下的多邊外交除了制度安排以外，也建構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及價值體系。冷戰結束後，西方的民主自由成為普世價值，也成為了美國主導的多邊主義核心。國際體系中的中小型國家，也設法善用多邊的制度安排，達成避險的目標。

近二十年來，中國以巨大的經濟體量，以及有別於西方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崛起於國際社會，引起舉世的矚目。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論述上，也強調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外交重要性，反對霸權的單邊主義。此外，中國也反對以單一意識形態主導的多邊主義。在外交政策執行上，主張站在廣大開發中國家一邊，建構以南方國家為主的多邊制度架構。然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多邊外交充滿疑慮。不少分析家認為中國的多邊外交，事實上是與美國爭霸的工具，其目的在輸出中國發展模式及意識形態。而其「一帶一路」計畫，則意在以經濟力量擴充政治影響力。而中國在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的滲透，則企圖改變或是重寫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朝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的方向發展。中國近年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並且推廣多邊主義的外交理念。因此，政治學界對於中國在聯合國的人權組織、維和行動、氣候協議參與策略與中國非洲各國的雙邊關係，皆累積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仔細檢視了近十年來台灣學界使用中英文撰寫，並且以中國多邊外交為主題的學術論文，發現我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理論觀點多元，但是對於議題項目仍有局限，無法觸及中國在

歐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區域組織的參與。因此作者依據台灣學術文章檢索的結果，將本文聚焦於東南亞國協、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台灣學者分析中國多邊外交的重要案例。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瞭解台灣學者如何研究中國的多邊外交，研究成果展現了哪些特色，以及與國際學術界研究此一議題的連結。有關台灣學者研究成果收錄的範疇，則主要以2012年之後的著作為主。本文首先就中國官方及學術界，以及國際學術社群，針對中國多邊外交概念及理論架構的研究，以及政策與執行層面的分析，作一整理爬梳。接下來則探討台灣學者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總體性研究，作出了何種貢獻，其與國際關係中多邊外交分析傳統的關聯性如何。此外，本文也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個案，探討台灣學者研究成果與國際學術界研究取向之異同。選擇的案例則以中國與東協的關係、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為主。本文最後則從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出發，提出未來研究議題與方向的建議，以期對未來的研究發展貢獻綿薄之力。

貳、中國與國際學術社群認知下的「多邊外交」：理論與概念的探究

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概念化過程而言，多邊外交的源頭是二次大戰後所建構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冷戰結束後，美蘇兩大陣營對峙不再，政治學界與智庫專家將研究重心聚焦於自由國際秩序的維持與挑戰。這個概念目前在國際關係領域是一個爭議性的議題，例如：現實主義學者認為自由國際秩序一詞本身是一個誤用，使用「以美國為世界強權所支持的國際秩序（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更能精確地描繪權力政治的本質。然而，根據目前自由主義理論、全球治理與政治經濟三方面的文獻指出國際關係學者，對於自由國際秩序一詞，有三個重要面向：重視法律規範（rule-based system）、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這三個概念對於二次大戰後國際組織與區域組織的運作有著長遠的影響（Larson 2022）。

多邊主義是國際關係領域中一項重要的研究主題，而其概念本身近年來也

經歷了一些變化。九零年代初期，多邊主義意指國家之間的互動，經由特定的組織或是制度安排，讓原本有不同利益與政策偏好的國家，形成共同的規範與原則，最終能夠達成具體的協議（Ruggie 1992）。因此，多邊外交的具體展現，在於主權國家願意遵守國際組織中多邊對話與協商的機制。

冷戰結束後，亞洲地區經歷了區域組織與多邊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從一九九零年開始，東協組織（ASEAN）便積極地主導亞洲多邊主義的進程，成立了亞洲區域論壇（Asia Regional Forum）、東協加三對話協商機制（ASEAN+3），以及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等，展現出東協組織在區域政治中關鍵的角色（Tan 2020）。國際關係學者Kai He對於亞洲多邊主義的發展，也提出了兩個不同時期的劃分方式。在一九九零年代到二零零八年金融風暴發生之前，多邊主義處於1.0時期，由東協組織所推動。從兩零零八年至今，亞洲多邊主義產生新的變化，進入了2.0時期，由美國、澳洲、中國、日本等國家，分別建立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印太架構（Indo-Pacific Framework），以及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這些區域外交機制皆不同於東協組織的所推動的多邊主義（He 2019）。He的研究指出，即使美中兩國在亞洲的權力競爭日漸白熱化，多邊主義1.0和 2.0仍然會同時存在，彼此截長補短，維持亞洲秩序穩定。

本文將著重於中國近年來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多邊協商機制，對於自由國際秩序的影響。美國學者Alastair Iain Johnston認為，由於國際政治中眾多的議題，包括不同類型的秩序與規範，因此很難針對中國是否對於（整體的）自由國際秩序造成挑戰做出一個定論。他進一步檢視國際秩序的本質，將現有議題分成：構成性、軍事、政治發展、社會發展、貿易、金融、環境保護、資訊等八大領域（Johnston 2019）。江憶恩認為未來國際關係學者可以依據不同的領域，發展出具體可操作的定義，更深入理解中國多邊主義與世界秩序的關係。

近年來，國際關係學者也採取不同觀點探討中國在多邊組織的參與策略。例如：Xiaoyu Pu運用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的理論，仔細描繪出中國自身在國際組織內角色的變化。隨著國家實力提升，中國政府也更積極地加入國際組織，從早期的規範接受者（norm taker）逐漸轉變成規範製造者（norm maker）。因此，社會化並非是一個單項進程，而是由中國、國際組織、政治

規範三者複雜的互動過程（Pu 2012）。Jessica Chen Weiss與Wallace提出以一個威權政體的國內政治的角度，理解中國參與國際組織與多邊主義的策略。他們認為中國國內政治中的集權程度（centrality）與不同政府部門間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是兩個重要的因素，進而影響中國政府在一些特定議題上，是否給予積極或是消極的官方態度（Weiss and Wallace 2021）。總體而言，中國多邊外交涵蓋了不同議題範圍，因此很難以一個挑戰者或是現狀維護者二分法的標籤，描述中國近年來外交政策的轉變。

上述研究呈現出對於多邊主義的概念較抽象與長期的理解。如果採取「中國與特定多邊組織之互動」的定義來檢視中國與東協的關係，以及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畫，那麼前者的本質仍然屬於中國-東協的雙邊關係，而後者是屬於複合式的雙邊關係，亦即中國與個別國家簽訂投資計畫。然而，此種對於多邊主義概念嚴謹的劃分，將無法觸及近年來東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對於這項議題多元分歧的研究途徑。本篇論文採取回顧的方式，檢視近十年來臺灣與國際政治學者對於多邊外交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採取比較寬鬆的標準，呈現出不同的理論觀點與概念演變。中國和國際組織互動的策略、或是中國逐漸參與全球與區域治理的過程，都是目前國際關係領域中探討中國多邊外交的範疇。

誠然，對於多邊主義的形式與定義，中國、臺灣與西方學界看法不盡相同。本論文檢視近十年來，政治學者所發表關於由中國所主導推動的多邊機制與對話平台之中、英文學術文章。例如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畫、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以及中國參與由亞洲國家所主導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等。本文中所提及的個案研究，不僅能夠展現出中國在不同議題類別上，如何推動多邊外交的策略，同時也展現出中國政府在「多重雙邊主義」的互動框架中，增進自身的利益。因此，中國多邊主義奠基於中國與個別國家的雙邊關係基礎上，以此逐漸發展出多元且有彈性的互動方式，具體地反應在中國外交政策的推行（Liu 2020）。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0年代進入聯合國後，對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多邊架構並不特別積極。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美中對立的態勢逐漸成形，中國對多邊外交轉趨積極，並提出中國對多邊外交的詮釋。習近平在2022年金磚國家第十次領導人會議中提出中國版本的「真正的多邊主義」包含了：

「維護公道、反對霸道，維護公平、反對霸凌，維護團結、反對分裂……深化反恐、網絡安全等合作，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框架中協調，在國際舞台上為爭議發聲……全球發展倡議，旨在推動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再出發，推動建功全球發展共同體。推動倡議走深走實，助力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此外，習近平強調『金磚+』模式不斷深化拓展，成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開展南南合作『實現聯合自強的典範』。」（人民網2022）

王毅也提出中國對「偽多邊主義」的反對意見。王毅指出，儘管西方與中國在諸如民主、人權等西方核心議題上有所歧異，但是中方的多邊主義論述有其特殊的邏輯。中方認為多邊主義有力地推動了國際秩序的民主化與現代化。中國的多邊主義是以聯合國為中心，以區域合作組織為補充，國際法為基礎推動世界各國超越社會制度、歷史文化的差異，並反對以莊家通吃、冷戰思維為內涵的「偽多邊主義」。中方的多邊主義也特別強調各國應拋棄意識形態偏見，尊重彼此的發展道路（王毅2021）。多邊主義的目標之一是推動對話，承認分歧，促進互相瞭解。

由此可見，中國版本的多邊外交，富含「反霸」的意義，同時高舉道德主義的大旗，以及南南合作的訴求，以期建構一個更公平的國際秩序。反美國的單邊主義，是中國多邊外交的主軸。準此，秦亞青認為，美國主導的多邊秩序事實上是遂行其霸權制度主義（hegemonic institutionalism）。而激進民族主義與硬性現實主義的出現，其根源事實上是治理的效果不彰。以任何一種單一治理模式貫穿多邊治理，勢必窒礙難行。國際社會必須容納更多樣性的治理模式，更多元的行為角色，避免單一國家的自我中心主義，方能以經濟福祉為核心，重建全球治理的互信（Qin 2020）。馮紹雷（2021）則指出，美國從阿富汗撤退，更使得原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轉型，進一步轉向觀念型態多元化，發展道路多樣化，力量結構多極化的架構。因此，新的多邊主義會與原來美國的霸權秩序脫鉤。更多國家採取新中立或不結盟的態度因應國際變局，以期超越對抗，化敵為友。根據馮紹雷的說法，各民族自主選擇自己的道路，是更廣義上的對自由價值的訴求。鄭永年（2021）則認為西方對中國多邊外交的攻

擊，主要源於西方國家內政治理不彰，將國內不滿的注意力轉嫁到中國。鄭永年認為中國的多邊主義2.0版本有以下三個特點：（1）多邊的；（2）針對問題的，如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等；（3）開放包容的，也歡迎美國參與。鄭永年也認為當前中國已有能力在多邊主義2.0的基礎上改造現有國際秩序，爭取話語權，但避免「把自己看成世界」。這種提法顯然是針對美國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自由開放印太策略等因應中國崛起的多邊安排而言。

中國在推動多邊外交時，的確具有「反美國的單邊主義」的戰略思惟。然而這個以「反霸」思維的出發點，並不能夠代表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與區域組織的全貌。即便美中兩國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競爭激烈，但是中國仍然身處亞洲，面對眾多不同類型與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鄰國。因此，中國與國際多邊組織的互動策略，主要是基於國內政治發展、國家利益的認知理解、國際形象三種因素綜合考量。不論是多邊組織參與或是雙邊關係的經營，中國外交政策仍然以維護國家利益為最重要的前提。在中國的大戰略，反映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的宏觀視野。

此外，中國論述下的多邊主義，也重新賦予諸如民主、自由的實際內涵，並設法擺脫以安全為主軸的多邊架構，轉而以永續發展等民生議題，作為中國多邊外交的重點。舉例而言，中國資深外交官傅瑩用「systematic conversation」來取代「systematic rivalry」的說法。傅瑩主張，多邊主義不應植基於某一特定政治體系的理念。多邊主義應特別強調具有舉世普遍性的共享價值，諸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與自由。以歐盟為例，由於歐盟與中國都認知到多邊主義不是為單一國家服務，因此歐盟有責任化解美國與中國間的矛盾與歧見。中國與歐盟在具體與人類福祉有關的項目上，諸如公共衛生、食品安全等議題，有深入合作的空間。儘管中國與歐盟在投資保障協定上遇到不少障礙，但雙方仍於2020年9月簽訂EU-China Landmark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greement，結合食品安全、投資保障、智慧財產權，以及綠色數位伙伴的制度性安排（Fu 2021）。

更重要的是，多邊主義的思維與運用方式，確實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產生了具體的影響。黃瓊萩指出中國在國際干預的外交政策上，反映出本身「多重雙

邊主義」的觀點。例如：對於是否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中，投票支持或是反對干預利比亞和敘利亞兩國時，中國主要考量因素包括：中國與被干預國家的雙邊關係、中國與強權國家的互動和中國與周邊國家組織的關係共同決定（黃瓊萩 2015）。此外，近年來習近平主政期間，中國政府積極推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並將這個外交理念運用到中國多邊外交的運作之中，以包容性與連結性為主，深化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此一概念已經成為中國外交論述的基礎，幫助北京政府進一步推動新型大國關係（Bisley 2020）。

西方學者對中國多邊外交的分析汗牛充棟。不少著作也將中國的多邊外交放在美中關係的主軸中，以及認知差距的角度分析。此外，也將中國的多邊外交與亞太地區的特殊區域現況作一連結。如同T.J. Pempel（2019）所言，中國所處的亞太地區多邊環境頗為複雜。亞太地區有多種多邊制度安排，成員重疊，議題有合作也有競爭。由於大國權力衝突日益激烈，儘管有越來越多的多邊組織及制度，但各國合縱連橫更加複雜，亞太的多邊共識不容易達成。這種狀況可能會成為亞太地區的新常態。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崛起，其面對的外在區域多邊環境顯得特別複雜。在多邊架構下，各國對中國的認知也各有不同。美國對中國日漸具侵略性，以及霸權主宰的認知，也與期待失調有關。美國當初將中國引入國際多邊架構，主要是期待中國能被循化，成為西方認知下的民主自由市場經濟。Suisheng Zhao（2019）則指出，美國之所以認為多邊外交被中國誤用，成為養虎遺患，其根源在於美國心中不願面對一個實際存在的中國，只願意從心中理想的中國來檢視中國崛起，自然產生認知失調的狀況。

此外，不少著作不純然從國際體系的變遷出發，而是將中國的多邊外交與國內發展聯繫起來分析。Clarke（2019）的研究顯示，雖然中國的多邊外交主要的著眼點，是提供一個有別於美國的區域及全球秩序安排，但是為因應美國對中國的圍堵策略，必須在國內安全及經濟持續發展上繼續往前邁進。因此，中國的對外政策及多邊外交，必須與國內發展的考量一併分析。以一帶一路為例，中國的策略是以經濟工具整合中國西部國土與中亞地區的語言、文化，以及民族的多樣性。過去二十年來中國針對西部大開發的策略，著重在「對口支援」，將東部沿海富裕區域的資源與西部開發的需要整合，是一種內向型的發展機制。事實證明，這種「向東望」的發展策略並不成功。一帶一路則是「向

西望」的發展策略，以多邊的方式，面向國際，以確保國內發展的能源安全，並滿足反恐的需求。因此，中亞多邊機制的基礎仍是國內發展。此外，中國多邊外交引起諸多糾紛與疑慮，也與自身的經驗缺乏，以及跨國企業運作的失誤有關。Suisheng Zhao（2020）認為中國的國營跨國企業對外擴張過快，但沒有足夠的經驗管理風險，與地主國的關係也不順暢。中國銀行對外的資產管理及資源分配經驗也十分缺乏，因此形成「戰略透支」的風險。

John Owen（2021）同樣強調中國內政發展與對外多邊外交的聯繫。有別於適者生存的原則，Owen用「共變」（co-evolve）來形容中國對外政策的考量。與其被動去適應外在環境，中國的策略是主動創造利基（niche construction），改變外在環境，以利國內經濟發展，以及強化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向來不是韜光養晦，而是主動積極。只是在不同的時間階段，採取的策略不同而已。中國的策略是讓更多民主國家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同時弱化任何對中國國內發展不利的制度安排。準此，中國必須透過多邊外交，來創造利基，尤其是滲透進聯合國組織。與此同時，中國也推動南南合作，使得國際制度與組織對開發中國家更加公平。

Xue Gong（2019）也指出中國在東南亞國協國家中的多邊外交，也含有「分而治之」的戰略，以不對稱的雙邊關係與多邊外交並行，並從中極大化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東協國家強調團結，以防範中國的分而治之策略。對中國的信任度也持保留態度。但落實到執行層次，則可發現中國地方政府與東協國家的關係連結。Gong指出，地方政府對於投資合作備忘錄的簽訂有興趣，但是否能執行則是另外一回事。各地方政府之間也有競爭關係。在中央集權的狀況下，地方政府往往樂於簽訂紙上合約，但在執行上觀望，等待中央的指示。因此地方政府與東協之間的關係不如表象上如此密切。但是Ming Jiang Li（2019）對中國地方政府參與東協多邊外交保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他也認為中國對東協國家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但是李明江認為以廣西省為例，在經濟利益的推動下，地方政府成為多邊連結的推動器、執行者，以及加速器。透過諸如湄公河流域，以及北部灣等合作計畫，廣西對中央討價還價的籌碼增加。廣西地方政府也將中國-東盟博覽會、廣西-東盟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廣西各大學的東盟中心，將廣西打造成與東盟交流的關鍵節點。

此外，習近平主政以來所強調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展現對內凝聚文化共識，對外爭取國際話語權，以文化重新塑造中國形象的戰略企圖。因此，中國的文化多邊外交也成引人注目的研究課題（Huang, and Lee 2019; Wang 2018）。在聯合國的架構下，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以文化遺產保存作為多邊外交的平台，並以軟實力及文化交流淡化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在中國國內各地方政府也掀起「申遺熱」，將市場及經濟利益引入聯合國的多邊文化外交。然而，文化遺產作為一種多邊外交工具，與單純的「文化」傳承有不少的差距。文化遺產在一定程度上必須重新「建構」，並發展出有關遺產的論述。這些論述與國家認同、族國締造（nation building）的重新詮釋息息相關。在當代中國文化遺產多邊外交上，更展現出重整話語權，促進道德價值（moral values），建立國際標章（nation branding）等重要企圖。近年來中國政府將敦煌莫高窟打造成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強調敦煌在中國歷史上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另一方面藉由全球敦煌學的推動，將敦煌推上國際學術交流舞台。由於敦煌也是古絲路上的重要節點，因此敦煌也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五通」中民心相通的要項。

若從更細緻的層次分析，則中國的對外多邊外交是否會依議題、時間，以及涉及的對象有別，成為一個頗令人關注的研究議題。Kastner、Pearson及Rector（2018；2020）認為，將中國應對多邊組織的行為斷然認定為「挑戰現狀者」或是「不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未免以偏概全。中國如同其他大國一樣，參與多邊組織的行為主要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因此我們必須解析中國多邊外交的利益考量邏輯，以及參與的時機。中國的多邊外交可以被形容是「機會主義者多邊」（Opportunistic Multilateralism），「策略多邊」（Strategic Multilateralism）。在估量國際體系中主要大國的影響力，以及權力真空與否的變數，中國可能會採取搭便車（free rider）、趁火打劫（spoiler），或是積極與體系建構者（investor in global governance）。同時，隨著時間的演變，以及外在情勢的變化，中國的角色也會彈性調整，在三種角色之間互換。當多邊外交亟需中國參與時，中國的籌碼變多，姿態也會調高。當既有制度已由大國主導，中國不得不參與時，中國寧願採取搭便車的手段，有時陽奉陰違。在危機產生，需要中國出面時，則毫不猶豫會極大化中國的利益。在其他大國力有

未逮，而對自己利益有極大好處時，中國就會積極致力新的多邊組織建構。

參、中國與國際學者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政策與執行面的分析

中國外交政策在2010年開始，逐漸轉為強勢，讓周邊國家擔心中國是否會成為一個強大的軍事威脅。Hoo Tiang Boon對中國近年來的區域外交政策，提出一個較全面的理解。他指出中國官方論述中「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的概念（hardening the hard; softening the soft, HHSS），更能充分地表現出中國在亞洲外交政策的全貌。隨著中國國力提升，在國家核心利益上，官方與軍方展現出不妥協的強硬立場。但是在其他區域事務中，中國外交手段卻是更具彈性（Boon 2017；Lai 2020）。

誠然，在亞洲爭議海域中，中國海軍艦艇與空軍戰機巡邏不間斷。中國在東海區域建立航空識別區、在南海地區佔領了黃岩島，這樣的行為同時讓日本與菲律賓對中國雙邊關係惡化。但是與此同時，中國願意對亞洲國家提供更多經濟發展與雙邊合作的誘因，例如在習近平主席主政期間，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對亞洲各國帶來基礎建設發展的契機。此外，中國政府也願意與個別國家協商具體建設計畫。因此，中國區域外交同時展現出強勢與互利兩種面貌。

近年來中國學者多將東南亞國家國協組織（簡稱：東協）視為一個整體，進而探討中國作為一個亞洲大國，如何與區域組織互動。魏玲（2010）提出一個中國與東協兩者互動不對稱的研究架構，此架構包括中國國內的政治規範與理念的變化，以及中國與區域內國家互動的方式，這兩個層次同時構成亞洲體系的合作模式。在此權力不對稱的架構中，實力較強的一方成為東亞規範的接受者，而實力較弱的一方才能夠在長期交往過程中，對於強國逐漸產生信賴感（Womack 2006）。例如：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並且為泰國和印尼提供經濟援助，就是雙方建立互信的關係的例子（魏玲 2010, 12）。

在中國與東協建立對話關係夥伴二十五週年時，中國學者也回顧了雙方如

何建立「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國在2003年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逐漸被納入東南亞區域合作機制中，隨後中國也強力支持會員國簽署〈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共同維持亞洲區域安全。東南亞國家借助東協作為一個整體組織，經由條約簽訂與規範建立主導議題對話內容；而中國為了維護自身在此地區的利益，選擇遵守一系列準則。中國和東協在區域穩定以及安全議題上逐漸形成共識（范佳睿、翟崑 2017）。

2020年以來中美戰略競爭激烈，美國陸續在亞洲推出「印太戰略」與「美日印澳四方對話」的倡議，中國學者也逐漸關注中國和東協國家組織的互動，是否會因為中美兩國在亞洲的權力競逐而改變。張潔（2021）從東協中心（ASEAN centrality）的觀點出發，探討東協國家成員在眾多的亞洲區域組織與合作對話機制中，如何維持自身的重要性。2019年，東協提出自己的「印太遠景」，其中強調包容與合作，也為中國回應東協主體提供了更多外交空間。

由中國主導而成立的AIIB，一開始展現出中國不滿意國際經濟秩序、修正主義（revisionism）的外交行為。然而隨著AIIB本身組織利益的需求日漸提升，日常業務需要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金融組織密切合作，AIIB這個區域組織轉變成中國政府在國際體系中尋求更高地位的方式（status-seeking）。

John Ikenberry和Darren Lim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出發，探討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中國政府要如何運用自身快速累積的實力？冷戰結束後，中國逐漸融入國際體系，積極與東協組織互動，2000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近期更設立了AIIB，北京政府對於加入既有的國際組織，或是如何增進國家利益的看法為何？

這兩位國際關係學者進而檢視中國看待國際制度的邏輯為何（logic of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他們指出北京政府對於國際組織的選擇，呈現出五種不同的策略：同意現狀的行為關係者（status-quo stakeholder）、在制度中尋求更多權力與代表性（authority-seeking stakeholder）、在制度中進行阻礙或是改變規則（institutional obstruction）、外部創新方式（external innovation）、反對或是不參與國際組織（opposition）。這五種選擇如同光譜般從左到右，代表著中國官方對於國際組織的不同態度（Ikenberry, and Lim 2017）。兩位學者

認為中國成立AIIB，屬於一種外部創新的策略，同時為北京政府提供了新的契機，但是也為中國追求自身國家利益帶來了一些限制，因為AIIB制度設立和目前既有的多邊銀行相同，進而強化了國際經濟秩序。

2015年，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在中國政府主導下成立，與此同時中國、台灣、與西方學界展開一系列相關的討論，觸及亞投行與中國所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關係、中國是否想要徹底改變世界經濟秩序、中國如何管理亞投行的內部運作。孫伊然（2016）認為中國成立亞投行是一種「尋求影響力」（influence seeking）的展現。中國近年來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但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一直無法增加自身的投票權重，因此中國在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同時，必須要更為主動積極。此外，黃河（2015）從經濟學理論出發，認為亞投行的建立是中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國際公共財的行為。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確實有基礎建設與資金短缺的需求，因此亞投行可以作為一個整合的平台實現多種類型融資方式，為區域發展提供公共產品。

關於在亞投行的實際運作情形以及投票權重設計，政治學者也有所著墨。

Wei Liang（2021）將亞投行、亞洲開發銀行以及世界銀行的治理體制，做出系統性的分析。亞投行運作至今，仍然和目前多邊發展銀行維持密切合作，並且遵守既有的金融規範。然而，北京所推動亞投行，更加重視行政效率、簡化手續流程，以及讓借貸國有更多參與投資建設計畫的機會。這些在既有體制內的創新改革，是中國對於全球經濟秩序與區域治理的重要願景。

由於中國一帶一路計畫中涵蓋國家眾多，基礎建設計畫項目種類繁多，因此目前的學術文章，較難對中國陸上絲路與海洋絲路計劃提出完整的理解。David Lampton、Selina Ho、Cheng-Chwee Kuik三位學者在合著的專書中，探討中國在東南亞國家鐵路建設對於中國區域外交的長遠影響。

他們三人到印尼、寮國、緬甸、馬來西亞等國，進行實地訪問調查，了解當地中央政府、地方官員、一般民衆對於鐵路建設和經濟發展的想法（Lampton et al. 2020）。這些國家的國內因素，例如總體經濟發展程度、政黨競爭程度、特殊利益團體的考量，皆會影響該國如何回應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大型建設計畫。他們的研究指出。即使在和中國雙邊關係較良好的國家，例

如寮國和柬埔寨兩國，中國在當地提出的鐵路建設計畫，也是很敏感的政治議題，因此中國官員或是工程建設公司，應該要更深入瞭解每一個國家的歷史，傾聽當地社會中不同的聲音。

關於如何理解中國對外經濟投資與對外政策，英文文獻也指出為何威權國家領導人要發起大規模經濟建設計畫，與此同時次國家行為者（subnational actors）如何回應中央政府的訴求，是政治學科中一項重要的研究主題。Min Ye提出了一個國內政治動員的理論觀點，基於與中國智庫人員、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的實地訪談資料，她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由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過程（State-Mobilized Globalization，以下簡稱：SMG），國內經濟危機促成威權國家領導人必須發起大型建設計畫，例如一帶一路項目，並且提出遠大的政治藍圖，形成全國政治動員。然而，中國本身分散（fragmented state）的政治架構，讓地方政府有彈性空間，依據自身的利益來詮釋一帶一路計畫的意義，以及該如何具體執行建設項目（Ye 2020）。當中央領導人推動全球化的國家政策時，國內政治的行為者，例如地方政府，商業銀行，國有企業等，對於中央政策會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極權領導人、分散的政治體制、以及有力量的次國家行為者，三方互動的過程，促成了一項既有強烈企圖心（ambitious）、但是具體內容卻很模糊（ambiguous）的對外投資計畫。

在中國習近平主席主政期間，中國政府在2013年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隨後在2015年發佈了「共建一帶一路的願景行動」宣言，正式將一帶一路的理念推向全世界（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以下簡稱：BRI）。中亞與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世界各國智庫以及中西方政治學界對於這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型基礎建設計畫，提出熱烈的討論。

關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如何與目前亞洲貿易區整合，中國學者李向陽（2014）提出了一個全面的多元合作機制觀點。例如：海上絲綢之路可以和中俄蒙朝次區域合作整合、在東南亞地區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國協自貿區的升級版投資建設協議、在西亞地區以一帶一路倡議、加速推動中巴經濟走廊。李認為加強海洋絲綢之路中多元化合作機制的特點，不僅能夠和現行的貿易區並行不悖，還可以讓沿線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得到更多實質利益（李向陽 2014, 13-14）。

除了以宏觀的視角檢視一帶一路倡議的規劃，中國學者也關注特定國家如何回應中國日漸強大的經濟影響力。林民旺（2015）聚焦南亞區域大國印度如何回應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並且提出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國內政治觀點，深入分析印度政治菁英如何認知中國日漸提昇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目前有四個主要的觀點：地緣政治考量、新現實主義、馬漢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林認為印度主流觀點皆認為中國一系列的基礎建設計畫不僅只是出於自身經濟利益考量，同時也是基於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觀點而產生（林民旺 2015, 8）。儘管目前印度對於是否加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抱持冷淡的態度，但是中國和印度在中南亞與南亞經濟發展，仍有相同的利益，例如印度已經加入亞投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因此如何化解印度對於中國在南亞周邊區域擴張的野心，會是未來中國區域外交的重點。

一帶一路倡議所支持的基礎建設項目，也會增加各國政府、人民、與區域組織之間的連結。因此，王玉主（2019）從國際關係理論中對於全球秩序與主權國家互動的學術討論出發，理解中國習近平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中所強調和平包容的背景脈絡。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所強調由主權獨立的國家之間如何形成一個國際社會，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整合過程（Buzan 2004）。然而，王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大國，在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時，仍然是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出發，藉由「一帶一路」推廣基礎建設同時，形塑參與國家之間身份觀感的轉變，讓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形成一種新的區域認同。

肆、台灣學者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總體與概念的分析

台灣學者針對中國的多邊外交的分析，也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探討在不同的外在環境及影響國家利益程度上，中國如何在多邊與雙邊外交上彈性調整。趙文志（2020）則提出中國參與多邊組織的「內外有別」特色。當中國作為「他者」，不涉及核心國家利益時，則主張以聯合國作為行動主體。如在參與蘇丹維和行動時，雖難免有介入他國內政的考量，但由於參與聯合國

維和部隊是一個多邊平臺，同時也不是純然由西方主導的行動機制，因此中國在「創造性參與」上有更多合理化軍事行動的藉口。然而，當中國作為當事國主體時，中國的行動成為「我者」，其策略則為之一變。以南海爭端為例，中國作為當事國主題，即反對多邊的制裁機制，也反對以聯合國為主題的爭端解決機制（Lai 2019）。此時中國的政策是不將南海問題視為中國與東協的多邊關係，而是將爭端解決的關鍵放在多組的雙邊關係，由中國單獨與個別當事國解決。與此同時，中國同時也與東協國家談判「南海行為準則」，作為制度化的行動依據。易言之，當涉及到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時，中國則以歷史、文化、主權等論述，以不對稱關係取得上風。多邊機制也可以同步進行，但不是爭端解決的工具，而是既合作又鬥爭的靈活策略運用。此外，中國的國際多邊參與，與中國對全球化及全球轉型的看法有密切關係。吳佳勳（2018）分析了中國「新型全球化」的論述。從中國角度出發的新型全球化，現今的我全球化展現出來的特色是無效率的多邊化，以及治理的碎片化。中國無意揚棄當前的各種多邊機制，但希望致力於組織強化，調整其運作，並推出中國自己主導的多邊機制。更多新興國家及發展中國家應該成為新型全球化的要角。新的議題，尤其是數位治理、電子商務、綠色創新等議題，應該成為新型全球化及多邊組織的執行重點。

此外，中國的多邊外交也與美國霸權的合作及對抗，產生密切的聯繫。艾約銘、葉曉迪及張登及（2018）則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時間維度，強調中國在不同時期的對外政策有不同的考量，而雙邊與多邊外交就是在「內需型國家利益」、「外衍型國家利益」及「對抗型國家利益」三組機制中運作。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西方制裁的大環境之下，中國對外政策的重點是「安撫政策」與「多邊合作」，以保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以便致力於第二輪的國內改革開放。千禧年之後，中國國內的發展情勢區域穩定，以周邊國家連結為重點的外衍型國家利益成為主要對外政策原則。習近平主政之下，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則以「制度制衡」為美中爭霸的多邊軸線，亦即以美國主導的TPP，以及中國主導的RCEP的多邊制度之爭。在「對抗型國家利益」階段，中國大陸成為美國霸權的直接競爭者，而其策略則為制衡與合作的混合方式，一方面抵抗現有亞太霸權的圍堵，另一方面以多邊策略強化睦鄰政策，以經濟

利益安撫亞太周邊國家，化解霸權國家所施加的壓力。王宏仁（2017）的研究則指出，胡錦濤時代中國的多邊關係考量，以「互惠」為重要條件，以提醒多邊關係的成員國，中國的核心利益是顛撲不破的基本原則。到了習近平時代，多邊與雙邊關係靈活操作，但是與美國的關係則從多邊關係中切割出來，以雙邊的模式處理與中國核心利益關係最密切的一組關係。

除了美中關係的軸線，台灣學者也從全球化及「南南合作」的角度，指出中國在開發中國家的多邊外交，造就了全球政經權力格局的板塊移動。朱雲漢（2020）認為美國主流外交政策菁英低估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支撐全球多邊體系的能力與意願。非西方國家之間會構築日益綿密的經濟、能源、科技、資訊與金融交換與互助網路。而中國為這個非西方的網絡提供了可觀的國際公共財。以中國為首的「全球南方」正深化各種雙邊與多邊的經濟整合與政策協調機制。朱雲漢進一步認為，全球經濟舞台的要角，將由新興經濟體取代傳統的G7。此外，中國也將藉著進一步開放市場，搭建新的雙邊與多邊合作機制。這種由中國引領全球化路徑與遊戲規則的修正，將有別於美國主導的多邊機制，而將包容性成長目標放在更優先位置。朱雲漢分析指出（2020, 251），已開發國家真正需要關心的不是中國是否要選擇退出西方主導的體系，而是西方國家是否要積極加入中國主導的歐亞大陸經濟板塊，因為這將是未來世界經濟的中心。

此外，在反對霸權及冷戰思維的政策綱領下，中國發展「結伴而不結盟」的多邊外交原則。黃瓊萩（2022）比較了中國參與中非合作論壇（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以下簡稱：FOCAC）、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SCO）以及中東歐16+1的政策，發現中國參與的重點是建立與會員國之間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而非聯盟關係（alliance）。夥伴關係的重點是達成包容性與連結性，不像聯盟關係那般具針對性，因此避免採用聯盟關係來連結會員國，意在避免因針對特定國家或群體而升高外部環境的敵意和安全風險。此外，SCO和FOCAC另一個共同點是兩個多邊機制都是奠基於多組內涵與形式迥異的雙邊關係之上，透過這樣的設計，中國可以進一步穩固其在中亞區域的關係網絡，也能在區域內有紛爭發生時，利用既有的雙邊關係來確保中國在SCO相對優越而主導的地

位。所謂的區域，其核心在於建立一種社群成員能夠「一起做事（doing things together）」的情境，而這樣的核心價值，也正呼應了中國式的多邊機制一向強調的包容性以及務實性，不論在FOCAC、SCO或者16+1的設計上，都能看見如此特質。

由於中國的經濟體量龐大，與亞太周邊國家的多邊經貿關係往往與雙邊的不對稱關係互為表裡，而中國的對外政策也往往利用多邊及雙邊交錯使用，以確保國家利益。徐斯勤（2022）則指出，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協定，以下簡稱：CAFTA）為例，北京的政治邏輯始終凌駕經濟邏輯。由於中國與單一東協國家的不對稱性，因此中國的多邊外交也與雙邊外交交錯運用。而雙邊主義下的中國對外談判的政治邏輯，事實上與國內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一致。因此，中國的多邊外交，必須放在雙邊，以及國內政治的三層政治邏輯整合觀察分析。而個別國家在多邊的架構下，仍個別與東協成員國成立雙邊經濟合作模式，目的在制衡其他國家在東協的政治影響力。各國發動與東協的多邊區域經濟整合機制，事實上是一種制度上的軟性制衡的表現。

中國的多邊外交在實際運作上，與西方國家的操作原則不盡相同。除了美中爭霸的權力因素以外，作為西方陣營的歐盟與中國的交往，也涉及了利益面與規範面的衝突與合作。蘇卓馨（2021）比較了中國與歐盟兩種多邊主義的異同，以及多邊外交所遭遇的障礙及困境。蘇卓馨指出，雖然雙方都強調多邊外交的重要性，但中方主張的是「多極」，尤其是反對美國的單邊霸權主義。歐盟的多邊主義重點在「制度」。在制度化過程中，每一個國家的主權都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歐盟的制度性多邊主義，則展現在其「規範性」權力，把重點放在非物質性的影響力，試圖在與歐盟交往的同時，接受其價值標準。這些核心價值標準包含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等共同信仰。當歐盟著眼於中國市場時，權衡之計採取「靜默外交」，對中國人權等問題暫時擱置。但是當歐盟把中國當成體制競爭對手時，再加上近年來有關香港、新疆等問題，碰觸歐盟規範性權力底線時，歐盟對中國的「選擇性多邊主義」開始不滿，雙方基於多邊主義的交往基礎也逐漸動搖。

在議題及參與方式的選擇上，若是美國未扮演主導地位，而所涉及的多邊議題高政治（high politics）的程度不高，而中國有望加入規則制訂的過程時，

中國參與的意願就會提高。中國對於亞太區域外的多邊組織參與，基本上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以避免中國威脅論的蔓延。多邊組織若是美國沒有積極參加，或是美國不居主導地位，則為中國開闢了一個新的多邊外交舞台。冷則剛認為，以中國參與北極治理的多邊外交而言，最初中國將北極事務視為先置型外交（proactive diplomacy）的實驗平台。在2013年中國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北極理事會（Arctic Council）時，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對北極治理並不積極，大國衝突及安全事務也不是北極治理的重點項目。因此，中國參與北極多邊治理的核心之一是參加Arctic Economic Council，以永續發展、科學研究、經濟開發為多邊外交的重點。此外，由於北極治理是全球新興事務，許多規則制訂及制度建立尚處於草創階段。有鑑於中國在其他多邊國際組織的參與，受限於西方主導的既成遊戲規則，中國在北極治理的參與，一方面能加入規則制訂的程序中，另一方面可以貢獻如生態保護、原住民權益、科學研究等低政治議題，有助於中國多邊外交的創新學習，也有助於中國國際形象的改善。此外，北極區域治理也並非隔離於全球治理之外。北極相關事務與聯合國國際法公約、北極準則（Polar Code）及其他諸如漁業、全球環境變遷等全球治理項目環環相扣。而諸如歐盟等中國並未參與的多邊組織與機制，也是北極多邊外交的重要行為者之一。因此，中國參與北極多邊治理，整合了區域及全球多邊機制，既有多邊，也有雙邊面向。近年來大國政治與安全議題介入了北極多邊治理，也使得中國的北極多邊外交更形複雜（Leng 2018; Leng and Zhao 2020）。

除了針對中國總體多邊外交研究以外，台灣學者也針對特定議題展開研究。以中國的聯合國多邊外交為例，游智偉（2020）從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人員結構，分析中國如何平衡行之有年的和平共處五原則，與善盡多邊組織責任、擴大國家利益與聲譽幾個政策目標。游智偉認為，當中國對任務授權了解不足之際，傾向派遣文職人員參與，降低派遣軍警人員的主權意涵。而當中國對任務授權有一定程度瞭解之後，則軍警人員的參與增加。中國的政策目標在於符合人道援助，以及遵循不干涉原則。若此兩個政策原則都可達成，則中國參與聯合國多邊維和行動的意願就會提高。楊惟任（2017）則針對巴黎氣候談判，分析中國參與七七國集團及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並以雙邊多邊並行，重新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除了與美國與歐盟等主要行

為者簽訂雙邊協定，在氣候變遷談判中也與印度立場接近，採取合作聯盟的政策。

本節針對台灣與國外學者有關中國多邊外交的總體結構、策略、與內政的連結，以及在中美爭霸制約下的戰略佈局，作一整體解析。下一節則選擇中國多邊外交的個案，進一步對照台灣學者研究的重點，以期凸顯中國多邊外交的特色及趨勢。

伍、台灣學者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區域個案與政策分析

一、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國協組織（ASEAN）

近年來，中國實力崛起，對於亞洲安全秩序造成深刻的影響。Amitav Acharya認為中國、亞洲國家與東協組織，三方長期的互動過程，將形成一個協商式安全秩序架構（Consociational Security Order，以下簡稱：CSO）。這樣的安全秩序著重於中國與區域內國家貿易互賴密切，以及各項產業分工日漸專精。同時，東協組織架構一直維持共識決定的原則，避免有任何一個國家強行主導亞洲事務（Acharya, 2014）。因此，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CSO的框架下，也能繼續維持領導權共享的特色，美國、中國、澳洲、日本等國，都可以參與東協組織的對話協商過程。然而，Acharya也指出CSO並非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未來這幾年，如果美國無法對東亞國家，持續提供有力的安全保證，或是中國逐漸拋棄「睦鄰外交」原則，近一步造成東協組織弱化，那麼亞洲協商式安全秩序就會逐步瓦解。

台灣學者在中國與東協區域外交研究上，展現出相對多元的視角。中國於2010年開始於處理南海領土爭議問題時，立場轉為強硬。同時美國也強調亞洲海域航行自由的權利，強化與越南、菲律賓的軍事合作關係。陳鴻瑜（2011）在南海領土劃界爭議剛開始時，就認為這片海域會成為中美兩國權力競逐的熱點，因為雙方都將南海視為其勢力範圍。南海地區的衝突和冷戰時期的美蘇圍堵政策不同，而是由美國帶領和中國有領海爭議的國家，形成一種新

型的圍堵策略。東協組織中海洋國家與內陸國家，進而分裂成兩個集團，兩方對於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軍事部署有著分歧的意見。

在區域經濟整合上，台灣學者採取了雙邊關係途徑，更仔細檢視中國與東協自貿區成員國的互動。張雅君（2017）探討中國與越南長期的政治經濟發展，此研究指出由於越南在軍事實力與經濟規模處於弱勢，在雙邊貿易上高度依賴中國，因此對於自己對中國的依賴高度敏感。越南近年來積極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就是想要減輕國家貿易體系的脆弱程度。張的研究同樣也是奠基於中越雙方處在權力不對稱的基礎，呈現出越南對於雙邊貿易長期失衡下，持續性高度敏感的风险認知。

除了權力不對稱的觀點，近來台灣學者也採取了個案分析方式，解釋東協組織成員國中，對於中國資本投資有不同看法的根源為何。黃韋豪（2020）針對印尼與泰國進行深入比較，分析不同政治體制對於中國資本管制的差異。該研究中指出，近年來中國資本大舉投資印尼基礎建設，進而引起在野政黨質疑這些資金是否真的能夠為當地人民帶來充足就業機會和適當的生活水平；泰國在軍政府主政期間，言論與報導自由都被壓抑，無法像印尼在民主體制下，充分向社會大眾揭露中國資本對當地的衝擊，因此泰國政府可以大力支持中國投資項目（黃韋豪 2020, 19-23）。透過印尼與泰國的對照，台灣學界未來在研究中國區域外交的領域中，可以結合政治體制差異觀點，分析不同國家如何因應中國經濟影響力。

二、中國與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

當北京政府宣布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時，西方國家與學界大多認為這個國際組織設立，代表者中國已經展現出挑戰目前全球經濟秩序的野心，並且更專注於增進自身地緣政治利益。Jeffrey Wilson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AIIB作為一個多邊組織，本身的目標與規範也會經歷演化的過程。對於中國而言，從一開始的政策倡議，到設立AIIB的一連串的溝通過程，如何設立總部、主席、董事會等，這些步驟都是北京政府的學習過程。例如，為了要爭取更多國家加入AIIB，中國必須要讓組織架構與決策過程

更加透明公開，貸款條件與監督機制也要符合目前發展金融的規則（Wilson 2017）。

台灣學者則從多邊治理與區域金融角度來理解中國與亞投行的關係。邱昭憲（2017）仔細對照了亞投行與世界銀行的現行制度架構，他認為北京試圖藉由亞投行改革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金融管理機制，並且建立一套與目前西方建制共存的多邊治理方式。然而，亞投行對於中國外交政策而言，仍然具有深刻的戰略意涵，目前亞投行所批准的融資項目，多以基礎建設與能源開發為主，能夠進一步滿足中亞、南亞、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需求，並且同時成為中國區域外交的擴展地帶。關於如何將中國一帶一路與亞投行運作更緊密結合，賽明成（2015）提出成立亞投行債卷並且同時成立以人民幣計價的「帶路基金」想法，然而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有限，而且美元仍是國際經貿交易的結算貨幣，如此前衛想法，似乎為中國設想了一個遠大的藍圖，但是當前確實能夠執行的前景依然不明確。

三、中國與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關於中國政府和加入BRI國家之間的互動，台灣學者的研究則呈現比較多元的觀點。Chienwu Hsueh（2016）從台灣角度出發，試圖理解台灣政治中泛藍與泛綠政黨，如何看待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馬英九總統主政期間，國民黨認為台灣要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計畫以及亞投行，但是台灣政府參與這些計劃的前提必須建立在北京政府在正式名稱許可下才能進行，當時民進黨作為在野黨，立即對這項提議提出強烈質疑，他們認為參與中國主導的基礎建設計畫，不僅容易加深台灣對中國經濟依賴，更會矮化台灣政府的主權地位。

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眾多，含跨中亞、東南亞、非洲與大洋洲，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程度差異甚大。吳書嫻（2018）聚焦於中國大型基礎建設計畫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具體影響，以越南永新電力中心進行深入個案分析，探求為何當地民衆在2015年與2018年爆發兩次大規模暴力抗爭事件的原因。吳指出中國國營企業在當地施工進度落後、工程品質不佳並造成巨大環境污染，三項因素形成越南國內輿論對於中國承包商強烈反感，進而傷害了中國在越南的外交形象。永新電力中心的環境污染與人民抗議事件，成為發

展中國家在接受中國基礎建設投資案時很重要的借鑑。

此外，蔡政修（2019）採取網絡文化的權力觀點，探討中國目前強力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在中美兩國權力競爭下形成何種局限性。中國政府強調開放包容性的成長、各國有不同的發展道路，這樣政治論述是基於中國外交政策中「和平共處五原則」出發，然而雙贏合作的訴求仍然是基於共同利益的物質考量，無法引起全球公民社會的支持。此外，中國在開發中國家快速推行大規模基礎建設計畫時，並未同時推行透明公開的執执行程序、貸款抵押的條件以及揭露對當地環境衝擊的風險，因此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裡，寮國、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家都陷入債務危機中。

東南亞國家國協、亞洲基礎投資銀行與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近年來參與多邊組織與推動區域外交的重點。中國和台灣對於中國區域外交與多邊主義的文獻皆著重中國外交政策與國際關係理論對話、大國與小國之間的互動、區域主義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國學者多將中國政府、東協組織、BRI計畫，視為獨立的單元，觀察他們和其他的區域組織或是主權國家互動。台灣學者在研究這些議題時，較多將美國的影響力放入其學術討論中，同時亦專注於台灣政府如何回應中國經濟與政治的挑戰。

總體而言，在近幾年出版的英文學術文獻中，國際關係學者從更廣闊的視角，檢視中國多邊主義與區域外交。例如，崛起大國的整體實力迅速累積，對於區域秩序和國際組織長遠影響為何，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共同關心的重要議題。在歐美地區的政治學者，運用國際關係中既有的概念框架，探討中國崛起如何影響亞洲區域秩序和國際組織。對於中國近年來所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上述學者也呈現出和中國學術期刊不同的視角，前者較多從全球化市場與比較威權主義出發，理解中國推動海外投資與基礎建設的複雜動機，後者則著重於中國政府如何執行與推廣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建設項目。

陸、台灣學術研究社群特色之分析

如以上數節分析所顯示，在國際關係及中國政治研究領域中，有關中國多

邊外交的研究，是台灣學者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爲了更清晰呈現台灣學者對中國多邊與區域外交的理論及政策研析特色，謹以以下兩個表格羅列：

表1 台灣學者在本文中對於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成果總覽

作者名	研究主題	理論架構與方法
趙文志 2020	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參與策略	物質利益、多邊協商機制
Christina Lai 2019	中國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的海洋爭議	和平崛起論述、中國強勢外交政策
吳佳勳 2018	中國在國際多邊參與	全球化轉型、中國外交論述
艾約銘、葉曉明、張登及 2018	中國國家利益	制度制衡、安撫政策
王宏仁 2017	中國單邊和平外交	核心利益、多邊與雙邊關係
楊惟任 2017	中國參與氣候談判	發展中國家觀點、結盟策略
朱雲漢 2020	中國與全球化	全球南方、雙邊與多邊機制
黃瓊萩 2020	中國多邊外交與周邊政策	夥伴關係、共同感建立
Christina Lai 2020	中國軟實力赤字	核心利益、軟實力外交
徐思勤 2022	亞洲區域主義	國內政治、雙邊關係、與多邊外交三層次分析
蘇卓馨 2021	中國與歐盟多邊主義的異同比較	規範性理論、文本分析
Leng 2018	中國北極外交	區域治理、多邊外交
Leng and Zhao 2020	中俄北極外交	地緣政治、經濟與安全的互動關係
游智偉 2020	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行動參與策略	國家利益、國際規範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2 台灣學者在本文中對於中國區域外交的研究成果總覽

作者名	研究主題	理論架構與方法
陳鴻瑜 2011	美國、中國與東協三角關係	現實主義與區域安全
張雅君 2017	中國與越南雙邊關係	非對稱依賴理論、貿易自由化
黃韋豪 2020	中國資本投資東協國家	國際投資理論、國內政治觀點
邱昭憲 2017	亞洲基礎投資銀行規則與運作	全投多邊治理、制度分析
賽明成 2015	亞投行債卷與帶路基金	美元霸權、國際金融
Chienwu Hsueh 2016	台灣對於中國一帶一路投資計畫的觀點	國內政黨競爭、區域政治
吳書嫻 2018	中國在越南電力中心投資計畫	一帶一路倡議、個案分析
蔡政修 2019	中美關係與一帶一路倡議	全球網絡分析、權力政治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文認為，台灣學者研究的主題、取向，以及理論的選擇，也與台灣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息息相關。晚近學界也興起了台灣政治學研究的一些論辯。根據王德育及Achen的論述，台灣研究不是中國研究的一部分。其學術的獨特性與獨立性，與台灣本身的政治及身份認同有密切的聯繫（Wang, and Achen 2022）。本文的重點雖然不是台灣研究，而是台灣學者如何研析中國的多邊外交，但是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以及台灣本身的政治與經濟結構變化，凸顯了台灣與境外研究傳統的異同。

若就與台灣國家核心利益最密切的研究主題而言，無疑地兩岸關係，以及美中台關係是台灣學者研究國際關係及對外政策的主軸。戰後台灣學術界針對這兩個核心議題，累積了相當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此外，戰後台灣在政治、經濟、外交上高度依賴美國，對於美國「霸權」的認知，與中國大陸學界顯有不同。因此，對於美國「偽多邊」的霸權論述的攻擊，不會如同大陸學界般全面展開。相對而言，中國近年來在多邊外交的推展上是否蘊含開放包容，多元容忍的特色，台灣學者也抱持相對保留的態度。此外，由於台灣不再是聯合國正式會員國，因此針對聯合國作為中國多邊外交基礎的研析，以及中國在聯

合國以及「南南合作」的研究，相對中國及國際學者的研究成果而言，較少涉及。

由於台灣外交孤立，以及國際多邊性政府間國際組織參與受限的特殊情況，也引導了台灣學界從雙邊而非多邊角度瞭解中國的對外政策。此外，台灣學者也比較傾向從台灣的角度，而非從美國以外的歐洲或是東南亞角度，來理解中國的多邊外交。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台灣學者藉由訪談中國官員及實地觀察的途徑，瞭解中國對外關係及多邊外交的機會頗為困難。因此，台灣學界對中國多邊外交中例如「分而治之」等策略雖有引介，但無法從政策制訂者或是執行者的思路或實際佈局中，瞭解政策機制的持續與轉變。易言之，外在環境的特殊限制，影響了台灣學者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主題，以及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台灣學界近年來從中國的一帶一路等多邊外交策略出發，研究海上絲綢之路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事實上與我國近年來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息息相關。從前節國際學界有關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所述，對外關係與國家區域發展的結合性，是近年來研究多邊外交的重點之一。我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理論精進及通則化的努力近年來已累積了相當成果，但區域研究及區域比較研究需投注更多的精力。若以東南亞與中國多邊外交為例，東南亞各國的區域發展，以及中國西南地區的區域發展，如何與中國的多邊外交整合，需要比較政治、區域研究，以及國際關係學者的共同合作。台灣學界近年來有關中國區域發展及地方治理的研究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但結合多邊外交的研究尚屬少見。此外，就區域選擇而言，中國南南多邊合作是其外交重點之一。非洲作為南方國家最重要的基地，成為中國發展雙邊與多邊外交的重要場域。但台灣有關非洲地區的研究，實屬鳳毛麟角。

由於兩岸外交競逐的零和鬥爭，台灣學界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儘管重點不同，但無論從制度面或文化面分析，大多仍以現實主義傳統出發，以硬性權力為研究焦點。相對於兩岸關係及中國內政的研究，台灣學者有關中國多邊外交的出版，雖已有接觸的國際出版，但大多著作仍以中文為主，出版地主要在台灣。在選題方面，有關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及中國的多邊經貿外交、中國的文化多邊外交等「軟性」面向，以及中國在全球治理與多邊組織的「合作」

面向，則較少討論。此外，對外政策的制訂，以及多邊外交的執行，離不開政治菁英及個別政治人物的因素。台灣學者針對如習近平等最高領導人的政治人格，利用諸如文字探勘與內容分析等技術，已漸次展開系統性的研究。但是針對外交菁英的個人分析層次的系統研究，則尚屬稀缺。

柒、結論

本文分析指出，台灣學術界對中國多邊外交研究已累積了相當的成果。過去多年來，台灣學者針對中國的雙邊外交，尤其是美中關係，兩岸關係，或美中台三邊關係，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在中文及英文出版方面都已經獲得國際的肯定。對美外交及兩岸關係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但是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沒有任何一組雙邊關係能獨立於全球戰略，或是自外於更複雜的多邊網絡關係。因此，從多邊外交的角度，也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如何從防禦型多邊外交，演變成更積極的多邊行為。而此類多邊外交，如何與既有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以及中國作為開發中國家的身份相容，也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落實到有關中國多邊外交的實際行為，台灣學者對中國在各種國際組織之參與，可以形成研究團隊，以更有系統的方式結合理論與政策。中國以聯合國體系為多邊外交的核心，因此我國學者針對中國在聯合國的參與，包含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多邊機制，可以投注更多的心力。以目前最受矚目的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而言，中國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如何有系統地梳理中國內政發展與環境多邊外交的聯繫、中國的議題設定能力、與不同集團的合縱連橫，以及具體的談判策略等，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研究課題。此外，如同本文前面數節分析指出，中國的多邊外交往往與不對稱關係下的雙邊外交彼此交錯使用。如何掌握此類彈性運用的機制，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解析中國多邊外交的變與常。

中國的多邊外交與國內發展也有密切的聯繫。中國大陸的西南、東北，以及西北區域的發展，與東部沿海仍有一定的差距。這些區域的「走出去」戰略，並與鄰國建構更綿密的互利共生網絡，成為近年來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的新課題。由此可見，區域發展與外向型的多邊外交，是一體的兩面。除了中央層

級的大型國有企業集團以外，地方的企業集團也成為多邊經濟外交的要角。因此，中國的多邊外交，除了國際體系及中央政府層級，地方層級也逐漸成為多邊外交的要角。在「正式」的多邊外交維度以外，我們也可以進一步關注「非正式」的面向，尤其是中國的企業，以及與官方有複雜互動的非政府組織，在多邊外交中所起的作用。

隨著中美兩國權力競爭日漸激烈，東南亞國家與亞洲區域組織，已經成為兩國積極合作的重要對象。然而亞洲國家普遍擔心自身會受到雙方強大的壓力，最後必須要在兩國之間被迫表態。同時東協內的成員國也擔心東協在美國最近所主導的一系列區域倡議，例如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AUKUS）、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多邊合作，都有可能逐漸讓東協組織產生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的危機。因此，台灣學者可以關注中國在亞洲推動的外交政策時，如何取信於東協成員國，同時保持自己決策的主導性（ASEAN centrality），或是以長遠的視角檢視中國近年來積極參與亞洲事務，是否更加深了會員國之間在東協事務的歧見與分裂，上述兩項議題不僅對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組織利益形塑（organizational interests）與角色扮演（role play）兩項概念能夠做出貢獻，也能為台灣政府的提出具體建議。

此外，對於發展金融與區域治理有興趣的學者，在未來的研究計畫中，可以將中國BRI在中亞、南亞、中東地區，所推廣的大型基礎建設計畫，與AIIB核准的貸款項目，做仔細的個案分析，或是系統性地探究其中差異性。新冠疫情對開發中國家經濟衝擊巨大，部分參與中國BRI的國家陸續遇到程度不一的債務困難，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退之前，債務重組和多邊協商會是這些國家政府重要的挑戰，然而貸款延期或是違約消債的處理，在中國政府所主導的BRI計畫下，可能會比由既有國際組織如IMF和World Bank處理債務重整更加複雜。中國內部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以及負債國家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有自身考量，需要針對不同情況制定不同方針，台灣學者可以針對既有資料進行質性分析或是量化研究，對於區域經濟發展或是多層次治理應會有重大理論貢獻。

（收件：111年9月15日，接受：112年1月10日）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Researches of the Taiwanese academic society in comparative aspects

Tse-Kang Leng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Christina La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understand the approaches adopted by the Taiwanese scholars to research on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linkag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ociety. The scope of analysis is limited to research publications after 2012.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major theoretical concepts adopted by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Chinese academics on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followed by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outputs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ractices. Then the authors will analyze theoretical and policy linkages between Taiwanese scholar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ocieties on the macro aspects of Chinese multilateralism. The fourth part of this paper will utilize cases such as ASEAN, AIIB, and BRI to demonstrate the major research findings of Taiwanese scholars on the micro aspects of Chinese multilateralism. The concluding remarks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genda for Taiwanese academic society on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Keyword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Rise of Chin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參考文獻

- 人民網，2022，〈習近平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上的講話（全文）〉，<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623/c64094-32454893.html>，查閱時間：2022/07/02。People Daily online. 2022. “Xij Jinping zai jin zhuang guo jia ling da ren di shi si ci hui wu shang de jiang hua quan wen” [Speech by Xi Jinping at the 14th BRICS Summit (full text)]. (Accessed on July 7, 2022).
- 王玉主，2019，〈中國的國際社會理念及其激勵性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建設〉，《當代亞太》，5：4-29。Wang, Yu-zhu. 2019. “Zhongguo de guojishehuilinian jiqi jilixingjiangou—renleimingyungongtongti yu “yidaiyilu” jianshe” [China’s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ragmatic Constructivism: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5: 4-29.
- 王宏仁，2017，〈中國大陸的單邊和平外交與關係模式：習近平是新轉變，還是胡調重彈？〉，《中國大陸研究》，60（3）：1-20。Wang, Hung-Jen. 2017. “Zhongguodalu de danbianhepingwaijiao yu guanximoshi: xijinping shi xinzhuangbian haishi hutiaozhongdan?” [Mainland China’s Unilateral Peace Diplomacy and the Relationality Model: Is Xi Jinping Articulating a New Strategy, or Just Playing Hu Jintao’s Same Old Tune?].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0 (3): 1-20.
- 王毅，2021，〈王毅在學習時報撰文：深入貫徹習近平外交思想，高舉真正多邊主義火炬〉，http://www.gov.cn/guowuyuan/2021-07/09/content_5623753.htm 1，查閱時間：2021/08/02。Wang Yi. 2021. “Wang Yi zaixue Xi Shi bao zhuan wen: shen ru guan che Xijinping wai jiao si xiang, gao ju zhen zheng duo bian zhu yi huo ju” [Wang Yi’s article in Study Times: Thoroughly Implement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Hold High the Torch of True Multilateralism]. (Accessed on August 2, 2021).
- 朱雲漢，2020，《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台北：天下文化。Chu, Yun-

- han. 2020. *Quanqiu hua De Liejie Yu Zaironghe*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Fission vs. Fusion].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 艾約銘、葉曉迪、張登及，2018，〈中國崛起與「國家利益」的概念演變（1980～2016）：一個權力結構轉變的視角〉，《中國大陸研究》，61（1）：63-88。Ai, Yue-Ming, Ye, Xiao-Di, and Chang, Teng-Chi. 2018. "Zhongguo jueqi yu 'guojialiyi' de gainianyan bian (1980~2016): yige quanlijiegouzhuanyuanbian de shijiao" [China's Rise and Its Evolutionary Narrative of "Core Interest" (1980~2016):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Structure Transition].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1 (1): 63-88.
- 吳佳勳，2018，〈中國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與路徑探討〉，《中國大陸研究》，61（4）：1-29。Wu, Chia-hsuan. 2018. "Zhongguo de xinxingquanqiu huamoshi yu lujingtanta" [Looking at the Mode and the Strategy of China's Neo-Globalization].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1 (4): 1-29.
- 吳書嫻，2018，〈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在地影響：以越南永新電力中心計畫為例〉，《問題與研究》，57（4）：93-111。Wu, Shu-hsien. 2018. "Zhongguo 'yidaiyi lu' changyi de zaidiyingxiang: yi yuenan yongxindianlizhongxin jinhua weili" [Local Impac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Vinh Tan Power Projects in Vietnam as an Example]. *Wenti Yu Yanjiu*, 57 (4): 93-111.
- 李向陽，2014，〈論海上絲綢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機制〉，《世界經濟與政治》，11：4-17。Li, Xiang-yang. 2014. "Lun haishangsichouzhilu de duoyuanhua hezuojizhi" [On the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of Maritime Silk Road].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1: 4-17.
- 林民旺，2015，〈印度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及中國的政策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5：42-47。Lin, Min-wang. 2015. "Yindu dui yidaiyilu de renzhi ji zhongguo de zheng cexuanze" [Indian Perceptions of "One Belt One Road" and China's Policy Choice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5: 42-47.
- 邱昭憲，2017，〈中國參與全球多邊治理的競合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則與制度化的運作〉，《遠景基金會季刊》，18（2）：

- 1-43。Chiu, Chao-hsien. 2017. “Zhongguo canyu quanqiu duobianzhili de jinghezhanlue: “yazhoujichusheshitouziyin hang”guize yu zhiduhua de yunzuo” [Strategy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Exploration of Rules and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 in the AIIB]. *Prospect Quarterly*, 18 (2): 1-43.
- 范佳睿、翟崑，2017，〈規範視角下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構建〉，《當代亞太》，1：4-25。Fan, Jia-rui, and Zhai, Kun. 2017. “Guifanshijiaoxia de zhongguo-dongmeng mingyungongtongti goujian” [A Normative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a-ASE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1: 4-25.
- 孫伊然，2016，〈亞投行、「一帶一路」與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外交評論》，1：1-30。Sun, I-ran. 2016. “Ya tou xing yi dai yi lu yu zhong guo de guo ji zhi xu guan” [AIIB,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View of Internation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Review*, 1: 1-30.
- 徐斯勤，即將出版（2022），〈中國崛起與區域主義〉，《21世紀全球區域化研究導論》。Hsu, Szu-chien. Forthcoming 2022. “Zhongguojueqi yu quyuzhuyi” [The Rise of China and Regionalism].
- 張雅君，2017，〈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對中越關係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18（2）：45-97。Chang, Ya-chun. 2017. “Zhongguodongxieziyoumaoyi qu dui zhongyueguanxi de yingxiang” [Effects of CAFTA on China-Vietnam Bilateral Relations]. *Prospect Quarterly*, 18 (2): 45-97.
- 張潔，2021，〈東盟中心主義重構與中國-東盟關係的發展〉，《國際問題研究》，3：118-135。Zhang, Jie. 2021. “Dongmengzhongxinzhuyizhonggou yu zhongguo-dongmeng guanxi de fazhan” [Reshaping ASEAN Centr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118-135.
- 陳鴻瑜，2011，〈美國、中國和東協三方在南海之角力戰〉，《遠景基金會季刊》，12（1）：43-80。Chen, Hurng-yu. 2011. “Meiguo, zhongguo he dongxie sanfang zai nan hai zhi jiaolizhan” [A Tussle among the U.S.-China-ASE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rospect Quarterly*, 12 (1): 43-80.

- 游智偉，2020，〈任務授權與選擇性參與：中國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人力貢獻（1978～2018）〉，《政治學報》，69：1-29。Yu, Chih-wei. 2020. "Renwushouquan yu xuan zexingcanyu: zhongguo dui lianheguo weihexingdong de renligongxian (1978~2018)" [Mission Mandates and Selective Participation: China's Personnel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1978-2018)].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1-29.
- 馮紹雷，2021，〈從全球轉型看中美俄關係與歐亞秩序重建〉，《當代世界》，9：39-45。Feng, Shao-lei. 2021. "Cong quan qiu zhuan xing kan zhong me ie guanxi yu ou ya zhi xu zhong jian." *Dang Dai Shi Jie*, 9: 39-45。
- 黃河，2015，〈公共產品視角下的「一帶一路」〉，《世界經濟與政治》，6：138-155。Huang, He. 2015. "Gonggongchanpinshijiaoxia de yidaiyilu"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From a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od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6: 138-155.
- 黃韋豪，2020，〈南南合作或南向掠奪？解釋東協國家對中資南進的不信任〉，《問題與研究》，59（2）：89-125。Huang, Wei-hao. 2020. "Nannanhezuo huo nanxianglüeduo? jie shi dongxieguojia dui zhongzinaanjin de buxinre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r Exploitation? Examining Distrust to China's Investment in the ASEAN Countries]. *Wenti Yu Yanjiu*, 59 (2): 89-125.
- 黃瓊萩，2015，〈關係平衡vs.普世改造：中美國際干預風格與大戰略思維之比較〉，《中國大陸研究》，58（4）：71-82。Huang, Chiung-chiu. 2015. "Guan xi ping heng vs. pu shi gai zao: zhong mei guo ji gan yu feng ge yu da zhan lue si wei de bi jiao" [Relational Balance vs. Universal Transformation: A Comparison of Sino-US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Styles and Grand Strategic Thinking].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8 (4): 71-82.
- 黃瓊萩，（即將出版2022），〈習近平時代的中共對外關係：多邊外交與周邊政策〉，《習近平執政十週年》，即將出版。Huang, Chiung-chiu. Forthcoming 2022. "Xijinping shidai de zhonggongduiwaiguanxi: duobianwaijiao yu zhoubianzhengc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Xi Jinping Era: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Regional Policies].

- 楊惟任，2017，〈巴黎氣候談判與協議之分析〉，《問題與研究》，56（1）：31-52。Yang, William. 2017. "Baliqhoutanpan yu xieyi zhi fenxi" [Analyses on the Paris Climate Negotiation and Agreement]. *Wenti Yu Yanjiu*, 56 (1): 31-52.
- 趙文志，2020，〈中國大陸在衝突預防上的立場、態度與作為：作為第三方與當事國之間的比較〉，《問題與研究》，59（3）：45-80。Chao, Wen-chih. 2020. "Zhongguoda lu zai chongtuyufangshang de lichang, taidu yu zuowei: zuowei disanfang yu dang shiguo zhijian de bijiao" [China's Position, Attitude, and Action on Conflict Preven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ssu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outh Sudan Crisis]. *Wenti Yu Yanjiu*, 59 (3): 45-80.
- 劉曉鵬，2021，〈疫苗、債務、南南合作：新冠肺炎下的中非關係〉，《國際開發援助現場季刊》，4：17-23。Liu, Xiao-peng. 2021. "Yi miao、zhaiwu、nan nan he zuo: xin guan fei yan Xia de zhong fei guan xi" [Vaccines, Debt, South-South Conoperation: China-Africa Relations Under COVID-19]. *Development Focus Quarterly*, 4: 17-23.
- 蔡政修，2019，〈一帶一路上的美中角力：全球網絡文化的權力觀點〉，《遠景基金會季刊》，20（1）：1-60。Tsai, Cheng-hsiu. 2019. "Yidaiyilushang de meizhongjiaoli: quanqiuwangluowenhua de quanliguandian" [U.S.-China Competi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Perspective of Power Based on Global Network Culture]. *Prospect Quarterly*, 20 (1): 1-60.
- 鄭永年，2021，〈中國的2.0版是開放包容的多邊主義〉，<https://kknews.cc/zh-tw/news/yxempkg.html>，查閱時間：2022/06/15。Zheng, Yong-nian. 2021. "Zhong guo de 2.0ban shi kaifangbaorong de duobianzhuyi" [China model 2.0 is Open and 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 (Accessed on June 15, 2022).
- 賽明成，2015，〈顛覆中國？透視「亞投行債券」與「帶路基金」〉，《問題與研究》，54（2）：151-158。Shai, Ming-cheng. 2015. "Dianfuzhongguo? tou shi "yatouhangzhaiquan" yu "dailujijin" [Toppling China? Perspectives of

- the AIIB Bonds and Belt-Road Fund]. *Wenti Yu Yanjiu*, 54 (2): 151-158.
- 魏玲，2010，〈國內進程、不對稱互動與體系變化—中國、東盟與東亞合作〉，《當代亞太》，6：50-65。Wei, Ling. 2010. “Guoneijincheng, buduichenghudong yu tixibian hua—zhongguo, dongmeng yu dongyahezuo” [Domestic Progress, Asymmetric Interaction and System Change: China, ASEAN and Asian Coope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6: 50-65.
- 嚴震生，2018，〈第7屆〔中非合作論壇〕高峰會的初步觀察〉，《展望與探索月刊》，16（10）：1-7。Yan, Zhen-sheng, “Di qi jie zhong fei he zuo lun tan gao feng hui de chu bu guan ch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7th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Prospect & Exploration*, 16 (10): 1-7
- Acharya, Amitav. 2014. “Power Shift or Paradigm Shift? China’s Rise and Asia’s Emerging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8 (1): 158-173.
- Bisley, Nick. 2020. “Multilater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in Contested Asia. In Kai He, ed.,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2.0 and Asian Security Dynamics*, pp. 19-32. London: Routledge.
- Boon, Hoo Tiang. 2017. “Hardening the Hard, Softening the Soft: Assertiveness and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40 (5): 639-662.
- Buzan, Barry, and Barry G. Buzan. 2004.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Vol. 9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arke, Michael. 2019. “Beijing’s Pivot West: The Convergence of Innenpolitik and Aussenpolitik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9 (123): 1-18.
- Fu, Ying. 2021. “How China Views Multilateralism.” <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how-china-views-multilateralism>. (Accessed on September 2, 2021).
- Gong, Xue, and Daniel Balazs. 2021. “Emerging Soft Turn in China’s Energy

-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 *China Review*, 21 (4): 109-140.
- Gong, Xue. 2019.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32 (4): 635-665.
- He, Kai. 2019.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2.0 and Regional Order Transiti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32 (2): 210-220.
- Hsueh, Chienwu. 2016. “Taiwan’s Perspective o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5 (2): 37-60.
- Huang, Shu-Me, and Hyun-Kyung Lee. 2019. “Difficult Heritage Diplomacy? Re-Articulating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as World Heritage in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5 (2): 143-159.
- Ikenberry, John, and Darren J. Lim. 2017. *China’s Emerging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Prospects for Counter-Hegemon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19.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s: Rethinking 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2), 9-60.
- Kastner, Scott L., Margaret M. Pearson, and Chad Rector. 2020.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Opportunistic Multilateralism.” *Global Policy*, 11 (1): 164-169.
- Kastner, Scott L., Margaret M. Pearson, and Chad Rector. 2018. *China’s Strategic Multilateralism: Inves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i, Christina J. 2019. “Rhetorical Trap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9 (1): 117-146.
- Lai, Christina J. 2020. “Soft Power Is not So Soft: Is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hina’s Core Interests and Foreign Policy Practices Possible?” *Political Science*, 72 (3): 167-185.
- Lampton, David M., Selina Ho, and Cheng-Chwee Kuik. 2020. *Rivers of Iron: Railroads and Chinese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rson, Deborah Welch. 2022. "Is the Liberal Order on the Way Out? China's Rise, Networks, and the Liberal Hegem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OI: 10.1177/00471178221109002.
- Leng, Tse-Kang, and Zhu-Cheng Zhao. 2020. "Partnership on the Ice? Power Politics and Economic Engagement in Sino-Russian Arctic Diplomac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 1-39.
- Leng, Tse-Kang. 2018. "China's Arctic Diplomacy: Global and Regional Aspects." In Tse-Kang Leng, and Rumi Aoyama, eds., *Decoding the Rise of China: Taiwa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pp. 147-170. Palgrave MacMillan.
- Li, Mingjiang. 2019. "China's Economic Power in Asi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Local Guangxi Government's Role." *Asian Perspective*, 43 (2): 273-295.
- Liang, Wei. 2021. "China's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under Xi Jinping: Has the AIIB Served China's Interes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0 (128): 283-298.
- Liu, Hongsong. 2020. "Chinese Perception of China's Engagement in Multilater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cific Review*, 33 (3-4): 469-496.
- Nathan, Andrew J., and Boshu Zhang. 2022.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1 (133): 57-71.
- Otmazgin, Nissim, 2021. "An "East Asian" Public Diplomacy? Lessons from Japan, South Korea, and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45 (3): 621-644.
- Owen, John M. 2021. "Two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7 (5): 1415-1431.
- Pempel, T. J. 2019. "Regional Decoupling: the Asia-Pacific Minus the USA?" *The Pacific Review*, 32 (2): 256-265.
- Pu, Xiaoyu. 2012. "Socialisation as a Two-way Proces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4): 341-367

- Qin, Yaqing. 2020. "Reform Multilateralism Now: A Chinese Perspective." *Global Asia*, 15 (2): 12-17.
- Ruggie, John Gerard. 1992.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3): 561-598.
- Tan, See Seng. 2020. "ASEAN and Multilateralism 2.0: Locating ASEAN Centrality within the FOIP and the BRI." In Kai He, ed.,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2.0 and Asian Security Dynamics*, pp. 147-160. London: Routledge.
- Wang, Shuchen. 2018. "Museum Diplomacy: Exploring the Sino-German Museum Forum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4 (6): 724-740.
- Wang, T. Y., and Christopher H. Achen. 2022. "A Dialogue about Situating Taiwan Research Within Academia." <https://taiwaninsight.org/2022/05/03/a-dialogue-about-situating-taiwan-research-within-academia/>. (Accessed on November 18, 2022).
- Weiss, Jessica Chen, and Jeremy L. Wallace. 2021. "Domestic Politics,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5 (2): 635-664.
- Wilson, Jeffrey D. 2019.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rom a Revisionist to Status-seeking Agend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9 (1): 147-176.
- Womack, Brantly. 2006.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n, Xuetong. 2014.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 (2): 153-184.
- Ye, Min. 2020. *The Belt Road and Beyond: State-mobilized Globalization in China: 1998-20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ao, Suisheng. 2019. "Engagement on the Defensive: From the Mismatched Grand Bargain to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118): 501-518.
- Zhao, Suisheng. 2020.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s the Signature of President Xi's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9 (123): 319-335.